

#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的身份塑造

何伟文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视人为艺术品，即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有能力从大自然提供的原始材料中塑造出一个更完美的人。借用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的经典表述，人可以从“铜的世界”里创造出“金的世界”。这层含义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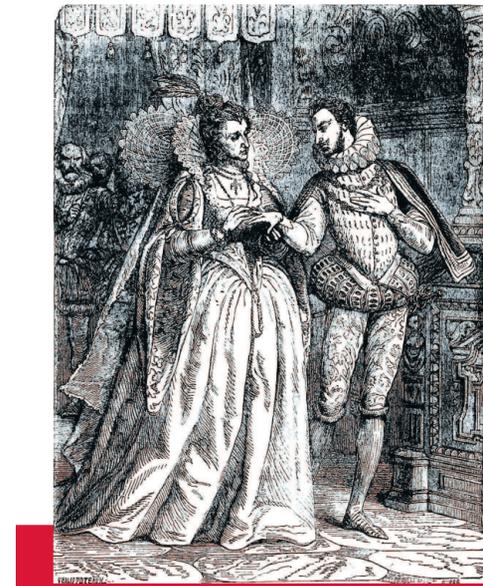
在欧洲古典世界，精英阶层普遍具有一种对个人身份塑造的自我意识，但后来在基督教文化中，这种意识不再广泛存在，人们对人本身是否具有这项能力产生了怀疑。比如，圣奥古斯丁宣称：“把手从你身上放开。如果你试图构建你自己，你将建立起一堆废墟。”他的观点影响深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广为流传，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发出不同声音。此时社会巨变以及人在其中的不确定性，使得主导身份建构的知识、社会、心理和审美结构发生了变化，人成了一种可以由自我来塑造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尤为引人注目，从臣民到君王都不乏身份塑造的意识和行为，真实和虚构的边界变得模糊，戏外人化身戏中人，进而呈现出一种表演。不过他们绝非只是为了娱乐，而是以此实现更为重要的目的。

## “你可以依据你喜欢的任何样式来型塑自己”

在中世纪晚期迈向早期现代的过程中，欧洲社会的剧烈动荡，连同地理大发现、宗教观念的变化等多重因素，促使人关于自我的意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在谈到意大利的情况时指出，君主及其秘书、大臣、诗人、随从等都失去了固有的身份，他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使之萌生了一种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新意识，自我和国家都变成了被塑造的艺术品。中世纪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人的塑造者，而到了早期现代，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却在《论人的尊严》中宣告，上帝告诉亚当“你仿佛是自己的创造者和塑造者，你可以依据你喜欢的任何样式来型塑自己”。一个人如何操纵外表、塑造身份、建构自我以及把它呈现于外部世界，如何判断它所产生的效果等，成为了一种修辞技巧，一种新人文主义教育首先要传授的新知识。

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情形与意大利颇为相似。此时英国社会处于巨大转型中，特别是从1580年代到1620年代这一被历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国的分水岭”的时期，原有的封建社会的结构被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开始建立，人们热衷于自我转型和表演。

一方面，人的自我意识变得日益强烈，他们把对身份的塑造视为一种可操作的艺术化过程。1589年，埃德蒙·斯宾塞写道，在他的史诗《仙后》中所谓



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追求者，John Cassell 绘，1865年

“塑造”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呈现一位绅士”，即培养、塑造一个人，使之像绅士一样呈现在他人的面前。斯宾塞在《爱情小唱》中向上帝人倾诉道：“你主宰了我的思想，自内而外地塑造了我。”这里诗人所使用的“塑造”一词，带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视人为艺术品的含义，即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有能力从大自然提供的原始材料中塑造出一个更完美的人。借用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的经典表述，人可以从“铜的世界”里创造出“金的世界”。这层含义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

另一方面，人们还格外关注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及其产生的作用。以锡德尼风靡一时的十四行诗组诗《爱星者和星星》为例，爱星者是诗歌中的第一人叙述者，他深深地爱上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星星史黛拉，非常在意自己给她留下的印象。在第四十一首中，爱星者说“今日我的骏马、手臂、长矛/被美妙地引导，广受赞誉”，深感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赢得了人们眼中流露出来的钦佩和赞赏，他们当中有英国人，也有一些“从可爱的敌人法国派来的人”。此刻与任何其他时候相比，爱星者都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他人目光中所占据的独特位置，骑士、镇上的人、法官，当然还有史黛拉，无不凝望着“我”。

“我”已经成为了表演者，渴望观众为自己的魅力所折服，更期盼史黛拉被吸引和征服。爱星者的这种藏而不露的目的通常是身份塑造的内在动因。

不同于古典世界，这一时期热衷身份塑造和表演的人，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同样出现在中下层社会。锡德尼在上述诗歌里描绘的情况，几乎都是现实世界中沃尔特·罗利爵士、约翰·多恩等文艺复兴时期雄心勃勃的英国精英的真实写照。罗利具有此类人物的典型特征，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寻求将艺术的品质赋予生活，以使生活艺术化。他强调人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随时转变成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不仅如此，人还能通过巨大的想象力和意志力，将艺术的象征性力量融入生活。如果说罗利们在诗人笔下以正面形象出现，那么更多热衷身份塑造的社会攀登者以反面形象出现，究其原因，是从十六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流动性快速增长，人们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可能性相应增加，中产阶级的地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上升，然而相对于全社会的需求，个体上升的机会仍显不足，由此导致文学作品中这类反面人物的出现。

罗利们和社会攀登者们的这类身份塑造意识同样为他们的君王所具有，伊丽莎白女王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炫目的

例子，它或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的身份塑造及其非同一般的意义。

## “她允许廷臣们表达狂热的爱慕之情”

伊丽莎白女王具有强烈的身份塑造和自我戏剧化意识，这与其试图通过骑士文化来加强统治密切相关。女王继位后，宫廷的官方语言把英格兰的过去追溯至亚瑟王时期以证明其统治权的合法性，同时伸张英格兰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权利，那么伊丽莎白女王所采用的是带有相同政治色彩但更具文学性的策略，即在宫廷文化中融入骑士传奇故事。尽管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崇尚的理想人物都已从中世纪的骑士转向了早期现代的绅士，但是女王大力提倡骑士文化，经常在宫廷中举行骑马比武活动，鼓励他们把她们的宫廷视为一个骑士风气盛行的地方。

原因在于骑士文化固有的特点有助于女王的统治。骑士的出现是封建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骑士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是奉献、宣誓和比武。骑士理想由此注定具有利己主义特性，但其本身却是植根于深厚的爱欲土壤中。荣誉、爱情和忠诚三个因素放在一起而且彼此相互影响，就形成了骑士风的主要内容。其中，爱情是这个领域的中心，其本质就是主体把自己的意识消失在另一个人身上，以至于达到无私忘我的境界。骑士的爱情主要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崇拜和忠诚，骑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她们服务，为爱情冒险。女王需要借助这种理想骑士的形象来控制急躁而莽撞的廷臣。在整个伊丽莎白时期，骑士品质和骑士故事都是宫廷诗歌和娱乐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女王对于骑士文化的利用明显不同于她的先人。骑士比武在都铎王朝的宫廷里颇为流行，观者中既有本国臣民，也有外交使节，这类活动对于再现和颂扬王室和贵族的权力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在比武中技压群雄无疑代表了令人折服的勇气和技艺，女王的祖先当年都是比武场上出生入死的直接参与者，如亨利二世折戟而亡，亨利八世在一次比武中几近丧命，国外使臣都敬佩他的勇武气概。女王不同于祖先，不能参加比武，甚至在比武场上奔跑也非她力所能及，她巧妙构思，重新布局，使得

整个比武活动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她这位最重要的观者而不是比武者身上。女王在1586年的一次议会演讲中指出：“我们君主被安置在舞台上，处于全世界观者的眼前或视野之中。”她充分认识到在舞台中心位置表演的价值，深知精心策划的仪式和表演是君王治国理政最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

女王从看戏人转化成万众瞩目的戏中人，通常在戏中把自己的身份塑造造成两类角色，其一是女神或者具有神性的人物。表演效果登峰造极的一次，应该是1572年在她面前举行的持矛骑马比赛：女王和所有的王公贵族都身着盛装华服，火炬把他们照得熠熠生辉，观众凝神屏气地注视着观礼台，仿佛置身于一座天国剧院，而非观看尘世表演。眼前的画面犹如剧院里的场景，恰到好处地呈现出女王所期望的形象：她好似幻化成一个具有神性意味的人物，让人不由自主地把她与希腊神话中主管正义的阿斯托利亚女神、古罗马的维斯太贞女，甚至基督教中纯洁的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女王高高在上的形象令观者惊叹错愕，心怀畏惧，目眩神迷，唯有仰望而兴叹。

其二是骑士倾心爱恋的情人。在宫廷举行骑马比武活动的时候，在欢闹的骑士氛围中，女王往往让她最重要的廷臣扮演自己的崇拜者，而把自己塑造成骑士或廷臣争先恐后表达爱意和忠诚的情人。女王的意图一望而知：廷臣不再是要求回报的仆人，而是匍匐在她脚下的恋人。他们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她的周围，而她是他们倾诉衷肠的对象；他们既成女王传统中备受相思之苦煎熬的骑士，那么服从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再者，正如研究者耶迪逊所言：“粗俗的乡下人只需花费几个便士，就可以看到骑士对女王顶礼膜拜的情景。”廷臣对女王的臣服必然会对围观的平民起到示范作用。

女王的身份塑造和表演并不会对她本人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代人弗朗西斯·培根鞭辟入里地指出，如果观众纵情观看女王鼓励的这类表演，就会发现它们像中世纪的浪漫传奇故事：“女王身处幸福岛、宫廷或者其他地方，她允许廷臣们表达狂热的爱慕之情，但禁止欲望。不过，假如你严肃地看待这些表演，它们实际上属于相当高级的层次，挑战了另一种形式的爱慕，因为无疑这些嬉笑调侃极少贬损她的声望，根本不会影响她的统治权，既不会削弱其权力，也不会对她实现宏图大业构成任何障碍。”女王主导的表演及宫廷里的浪漫气氛是按照她的意图虚构的，具有一种文学色彩，不会像现实中的爱情那样可能对王权构成危害。事实上，女王对权力的运作与对虚构的使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女王于1603年驾崩之后，在被称为“世界剧院时代”的十七世纪，戏剧主宰了西方文坛。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写道：“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尽管把世界比作舞台的时髦说法是当时对新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回应，带有明显的道德意味，即万事万物无不虚幻浮华、转瞬即逝而又毫无价值，但它同样表明人们对自我身份和自我戏剧化的强烈意识。概言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从臣民到君王均明显表现出一种身份塑造意识，角色扮演是他们生活的普遍态度。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

# 思考时像个天才，说话时像个孩子

编译/黎文

今天的作家们似乎总是在讲话——四处演讲，在书店说教，在脱口秀中发表意见。如果他们幸运得奖，会清嗓子，说些感激的话；而他们谈笑间不知不觉隐藏起来的书终于出版时，他们便会在播客或广播节目里大谈其中的“灵感”和“过程”。喋喋不休的作家们！他们什么时候才真正是在写作呢？

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Becca Rothfeld 观察到这一现象，于是邀请作家们闭嘴。正是因为口头表达直接又不精确，才出现了落到纸上这一“解药”，印刷品是对表达的一种保护。加之作家们都是一些与世界隔绝、在电脑前一坐半天，连一个小句子都删了又改、改了又删的人，而书籍和散文又是长时间思考的产物，作家们是不大适合即时表达意见的。这位年轻的评论家认为，作为文本的起草者、修改者，作家拥有那种永远在摸索、凡事无法确定的天性，这让他们成为糟糕的演说家——听作家说话其实是遭罪的。但她也知道，在这个播客当道的时代，反过来说是不讨喜的。但她找到了声援。

纳博科夫坚持以书面形式回应采访者的提问。他不喜欢说话，正是因为他担心当场说出的话会欠优雅，由我以书面形式回答，然后通过消除公开露面中的“沉闷部分”来打造一个更精彩的“人设”时，他解释道：

“我不是一个沉闷的演讲者。我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一个可悲的演讲者。我未经准备的演讲录音不同于我书写下来的散文，一如幼虫不同于成虫——或如我曾经表述的那样，我思考时像个天才，写作时像个杰出的作家，说起话来却像个孩子。”

他只同意在非非常规范的条件谈话：“问题必须以书面形式发给我，由我以书面形式回答，然后一字不差地印出来。”

即使一个作家碰巧擅长说话，这样的天赋也属偶然。善于在数周或数月内练习，并不能保证有任何即兴创作的能力。将生活虚构化或理论化的技能也与直入事物本质的能力无关。能够侃侃而谈的作家，并不是作为作家而成功，而是在其他方面成功。

不过，Rothfeld 也注意到，思想上喜好述而不作的大有人在。“德里达喜欢说话而不是写作，原因很复杂，我不太明白，而苏格拉底反对写作，理由是文本不能回答问题或回应反对意见。（他因此不喜欢事先写好的演讲稿。）”正如《斐德若篇》记录的苏格拉底的论证：

“文字……很像图画。画家的作品放在你面前就好像活的一样，但当你向它们提问，那么它们会板着脸的面孔，一言不发。……它不知该如何对好人说话，也不知该如何对坏人说话。如果受到误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自己却无力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保护自己。”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谈话更具合法性。活生生的话语，不过如本原，僵硬的书面文字“只不过是它的影像”。“伴随着知识的谈话……能为自己辩护，知道对什么人应该说什么话，对什么人应该保持沉默。”爱智者应该爱谈话。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不是弟子柏拉图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人们也不会知道苏格拉底的确切想法。

Rothfeld 担心的是，不善言说的作家难免犯错，而记录或公开他的失误，对于平日里字斟句酌的作家来说，是伤害，更是羞辱。某些读者狂热地给作家说的话纠错，在她看来比误解或偷窥更坏：这是彻头彻尾的施虐，是文坛的狗仔队。

## 论衡

# 超越地方性知识的地名

## 新版《地名管理条例》“新”在哪里

邹怡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地名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地名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相关地名管理工作。此处的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主要指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但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等地，习惯上由规划部门主管地名工作，故统称为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地名的命名和更名，须由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备案和公告，部分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电力等专业设施的命名和更名，则须事先征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由相关部门批准，再由地名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公告。

新条例“监督检查”一章便针对以往地名管理行政执法的疲软乏力，为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纠正地名乱象提供了明确的执法依据。若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在管理中不作为，“法律责任”一章则确定了相应的责任和惩戒。

管理什么？1986版《地名管理条例》所涉管理工作主要为地名的命名、更名及其审批，以及地名档案的管理，地名工具书的审定等。2022版《地名管理条例》在此基础上有了极大扩充，

这在条例制定宗旨上便能窥得一二。相较旧版，新版指出，条例的制定，除了为加强地名管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的需要以外，还着眼于适应人民生活需要，致力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应的，条例的适用范围，除地名的命名、更名和使用外，增加了地名的文化保护及其相关管理工作。

为此，新条例设立了专章“地名文化保护”，明确了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保护名录、做好档案管理、鼓励社会参与等要求。地名记录着地方的风貌，沉淀了生活的印迹，承载着民间的记忆，体现了历史的文脉。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文化传承，两者孰轻孰重，新条例做出了明确的权衡。值得注意的是，新条例在地名命名原则中规定，“不以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作地名”。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此条还相对委婉，“一般不以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商标名称命名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站点等城市公共设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显然，定稿在资本与文化的竞争之间，更为坚定地站在了文化的一边。此前，部分地方曾为了短期利益，有偿出让道路冠名权，不仅粗暴地斩断了凝结于地名的历史文脉，从长期来看，经济上亦得不偿失。知名企业不愿入驻其他企业冠名路段，招商引资因此受挫。冠名权的时效

与地名的稳定，也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新条例为此类错误的规避，提供了工作指南。此外，大数据时代，地名作为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承担着海量信息空间枢纽的桥梁功能。政府职能部门力推一网通办，分配服务资源、定位服务对象，地名信息均不可或缺。因此，地名管理必须与时俱进，拥抱数字科技。对此，新条例规定，由国务院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建立国家地名信息库，公布标准地名等信息，充分发挥国家地名信息库在服务群众生活、社会治理、科学研究、国防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服务信息化、智能化、便捷化水平，方便公众使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则应建立健全地名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

如何管理？1986版《地名管理条例》所涉管理工作较为狭窄，与之相应的工作程序也较为简略，甚至可以说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由此导致相关工作程序不够规范——老地名的更改、新地名的命名，科学论证不够，民意尊重不足，地名管理程序的薄弱也为资本牟利打开方便之门。城市化浪潮中，乡土地名的大量消失，“奇、洋、怪、重”地名的层出不穷便与之相关。为此，2022版《地名管理条例》

对地名的论证、审批、报备、公布、使用和监管作了全流程的梳理。为弥补事前论证的不足，新条例规定：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应提交风险评估报告、专家论证报告、征求社会公众等意见报告；其他地名的命名、更名，应当综合考虑社会影响、专业性、技术性以及与群众生活的密切程度等因素，组织开展评估、专家论证、征求意见并提交相关报告。论证过程中，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还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和文化保护等情况进行评估。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地名管理中的违规行为，可向地名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地名承载着人民的情感和乡愁，在管理程序上给予专家论证说理、公众表达意见的空间，能有效弥补决策机关的视线盲区，令决策者充分了解地名的历史意涵与现实所指，准确评估地名变更的预期成本，敬畏历史，尊重人民，理顺创新发展与文脉传承间的关系，达成两者的良性互动。

地名，尤其是非行政区划地名，在很长时间内，只是被视为一种自生自灭的地方性知识。区域间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家统一管理的加强，令地名逐渐超越地方性知识，并被提出标准化的要求。1986版《地名管理条例》的主要功用即在于将地名纳入行政管理范畴，推进地名的标准化工作。新时期的基础建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城乡面貌，地名随之发生大规模的消亡、更替与新生。时代已向地名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2022版《地名管理条例》即回应时代需求修订而成。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新版《地名管理条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比1986版，时隔36年第一次大幅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主要有哪些新的内容呢？

从形式上看，1986版《地名管理条例》未分章，共13条，内容覆盖地名管理的宗旨，地名的命名原则，地名的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地名的使用等。2022版《地名管理条例》扩充为7章，共44条。各章依次为：总则；地名的命名、更名；地名使用；地名文化保护；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新条例在结构上，明显增加了地名文化保护、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板块。具体内容上，地名命名、更名等条款虽延续1986版，但也有了相当程度的细化和充实。

条例的修订，是为了弥补、完善此前条例实施中的盲点、痛点。指示地理方位是地名的基本功能，地名亦因此与各种利益诉求相关联。地名管理的原则和程序，若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在权衡各方诉求，寻求妥善解决时，难免力不从心。

2022版《地名管理条例》重点在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等方面做了补充和修订。

谁来管理？1986版《地名管理条例》中，地名管理在中央由中国地名委员会负责，在地方由各级地名委员会负责，条例本身亦由中国地名委员会负责解释。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于1977年，为国家级地名管理机构，曾在制定地名管理法规，订立地名命名规则、编写规范，指导、协调中央、地方地名管理工作，组织地名调查，收集、整理地名档案资料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该委员会已在中央机构精简中被撤销，地方各级地名委员会亦因各地情况不一，或保留、或撤销。旧条例所定管理主体及相应体系实已无所本。

为此，2022版《地名管理条例》明确：国务院民政部门，即国务院地名

文汇报学人 第505期

